

# 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 文教界的組織活動

桑 兵

抗日戰爭時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勢錯綜複雜，國內外多種勢力互相角逐。由於政治中心南遷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機構相繼離去，北平依然保持着傳統的學術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對於社會各界有着相當廣泛的影響力，因而各方均重視爭取和利用學人，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左右政局。南京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政治權力鞭長莫及的情況下，尤其想借助學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擊漢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鞏固中央。關於這一問題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七七事變前知識界的對日態度及其分歧變化，且多取材於《獨立評論》、《國聞周報》、《東方雜誌》、《大公報》等報刊的公開文字。①近年來，隨着海內外學人對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的利用逐漸增多，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對於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組織聯絡及其在抗戰爆發後的延續活動陸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②只是相對於事實本身與資料的留存，還有許多層面未經揭示。以朱家驊檔案為基本，參照其他相關資料，可以進一步探究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如何通過爭取有影響力的學人鞏固和擴張其在故都的勢力，以圖實現其整體的戰略目標及政治目的。同時也可以透視中國學人在國家民族大義、黨派政見分歧與學術自由獨立之間平衡取舍的態度傾向。

## 一 指導平津新聞

國民政府移都南京，有着多重考慮，其主要目的，當然在於避開日本對華北的巨大壓力，爭取緩衝的空間，建構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政治格局，以應付內外交困的局面。但是這樣一來，在政治和軍事上，南京政府對華北無法實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國民黨急於扭轉五四以來不破不立的革命與自由的風氣，回歸穩定的傳統，以利於政權的穩固與思想的控制，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北京學術文化界的追求發生尖銳對立。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黨化教育以及思想鉗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學人的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學以取代北京大學的地位，進而影響全國風氣的做法，更引起政見各異的北方學人的強烈不滿。③因此，盡管國民黨與北京大學乃至整個北平文教界新派師生的淵源不淺，雙方的關係還是相當疏離甚至時而緊張。

1936年夏，北方局勢，日趨複雜。日本企圖策劃北方數省，脫離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漸侵略。其時河北一帶由宋哲元部二十九軍駐防，一切地方行政，概歸宋氏主持，對日折衝，亦由宋氏就地應付。國民政府鑒於國力未充，實行安內攘外政策，對北方情形，暫時隱忍，不肯加強政治壓力，只從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輿論，以為將

來抗敵之準備。

6月13日，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朱家驊電告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中央擬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導平津新聞，倘荷同意，即將公事與辦法寄上，並酌定經費。此事兄任頗宜，時間亦不甚費，乞勿却。”<sup>④</sup>顧頡剛與朱家驊均出身北京大學，1920年代在中山大學任教時又得到主持校務的後者的知遇，且因古史辯的引人注目在學術文化教育界聲望已高，並勇於任事。“九一八”事變後，燕京大學成立中國教職員抗日會，顧頡剛擔任宣傳幹事，以出版大鼓書詞對民衆進行宣傳，並成立了三戶書社。後因抗日會無力資助，轉向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杰求援，並應後者要求於1933年10月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脫離燕京大學抗日會而獨立，宗旨也有所調整，“目標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於國民道德之培養及現代常識之灌輸，蓋救國大業固非但恃血氣之勇若義和團者所可勝任。”該社面向民衆的宣傳活動漸引起國民黨的注意，以為社中人都是共產黨，陳立夫以此為由欲將其封禁。顧頡剛為此於1936年1月帶了該社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時任交通部長的朱家驊求援，後者表示支持，並乘機動員顧頡剛加入國民黨。顧氏為了社務，只得同意，風波遂告平息。<sup>⑤</sup>

由於上述因緣，顧頡剛接到朱家驊來電，復電允諾。朱家驊遂與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磋商，規定經常研究費每月五千元，開辦費一千五百元，請顧頡剛在北平籌辦新聞事業。7月3日，顧頡剛與傅斯年一同南下，到南京面見朱家驊、葉楚傖，商議通俗讀物工作，並作通俗讀物計劃書，擬定下年度下層工作計劃。該社由顧頡剛、徐炳昶任正副社長，王守真任總編輯並主持日常工作，趙紀彬任編輯，李一非任總務主任，一年之內工作人員增至40人。<sup>⑥</sup>10月5、7日，顧頡剛兩度致函朱家驊並報告工作進展：已組織通俗讀物編刊社，發行《民衆週報》和《大眾知識》二種期刊，編印叢書如通俗劇本、鼓詞唱本，旨在啓迪民智，宣揚愛國思想。此外還印刷連環圖畫，與山東省教育廳合作，編印《求生之路》月刊，與《晨報》合作，在該報發刊“生活與教育”，並調查培訓

北平市的評書和鼓詞藝人，希望深入民間，廣事宣傳。

從上述淵源看，朱家驊與顧頡剛表面的一拍即合，背後其實各有所求。關於此事原委，朱家驊檔案所藏《與顧頡剛商洽北平新聞事業》的編纂者主要從對日方面立論，強調“激發愛國情緒”，“喚起民族意識”，其實事情顯然並非如此單純。該文稱由朱家驊推薦顧頡剛在北平舉辦新聞事業，但據前引朱家驊的電報，派人主持其事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旨意。其時朱家驊剛好因汪精衛內閣辭職而失去交通部長的職位，接任因丁文江逝世而空缺的中研院總幹事一職。<sup>⑦</sup>根據相關資料，可能的情形是，動議應為葉楚傖，選擇顧頡剛則由朱家驊提議。而主要目的，決不單單在於對日準備。朱家驊和葉楚傖看過顧頡剛的來函及工作報告，對其進展成績甚為滿意，10月12日朱家驊復函道：

“成舍我君事據云伊為聯絡《世界日報》起見，曾與談起對於北平教育之溝通與青年思想之問題，擬請兄與孟真兄稍為幫忙，並未提及經費。或請逕函子公，設法補救。此事弟處甚為秘密，從未告任何人，甚至院中會計主任，亦僅辦領款匯款等手續，未知其他底蘊，並祈嚴守秘密為荷。對左傾分子之工作，應請十分注意，隨時糾正其思想與言行，使人正軌，免為所乘，而致妨礙工作之進行。聞河北省內有天主教徒七十萬之眾，為該教在中國勢力最鉅之區，宜設法深入工作，使有民族觀念，效忠國家。廿九軍士兵頗具國家觀念，應設法更增強之；對宋及其他高級將領，亦須妥為聯絡，促其擁護中央，使知統一與救國關係。以上各點，均關重要，至祈隨時注意及之。”

解讀是函，有四點值得特別注意：其一，國民黨中央注意與北平教育界之溝通及青年思想之問題，重要的考慮，是隨時糾正左傾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教育界和青年的思想言行進入正軌，以免受左傾分子的影響，其背景當與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關係密切。其二，宣傳的重心，是強調統一與國家的關係，所謂效忠國家，增強國家觀念，無疑包含具有民族觀念，更重要的則是擁護黨國一體的中央。其三，此時朱家驊的正式職務

雖然是中研院總干事，資助的領款匯款等手續也由該院的行政部門經手，但這既非該院的管轄範圍，也不是朱家驊的個人行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始終介入，其間朱家驊又一度兼代該秘書長之職，<sup>⑧</sup>則應視為國民黨中央的秘密安排。其四，除教育界和青年外，天主教徒、軍隊的士兵和將領也是工作的對象，則頗有為國民黨中央在華北秘密代言的意味。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顧頡剛14日即來函報告北平人士對事變的態度，對於張學良的“不顧大局，肆意妄行”表示“曷勝傷痛”。據稱北平同人主張四點：（一）希望政府以政治手段解決，勿遽討伐，俾蔣介石安全。（二）希望中樞充實，即使蔣不能遽復自由，亦可維護國家之統一，并照蔣原定計劃進行。（三）綏遠戰事仍須由中央主持，勿以此次事變，致懈軍心，且表示政府徹底抗敵之決心，藉以間執任意批評者之口。（四）華北地方當局環境不同，因之態度未能一致，政府應竭力消除隔閡，俾其能徹底擁護中央。朱家驊於19日復函表示，西安事變影響國家民族前途極大，北平人士主張的前兩點，“須於堅決迅速方法之下行之，方能有效，否則特增危險，國家前途，亦將不堪設想。後兩點原系中央一貫之政策，日來中央態度極為明顯，決不因西安事變而有所改動。”這時朱家驊已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就任浙江省主席，暫時仍兼中研院總干事，所以他一面對通俗讀物社的各種刊物風行一時表示大為快慰，一方面告以“此事仍由中研院王君辦理，下次到京當再與葉先生切商之。”并特別強調：“此次張逆叛變，受人民陣綫活動之影響亦多，此輩邪說，北方所聞較多，年來赤匪之禍，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已不計其數，僅江西一省人口減少八百余萬，全國當在二千萬人以上，此為我人所不可忘者。切望兄等特別注意，嚴加駁斥，以正視聽。”

朱家驊專門叮囑其注意反共一節，除了貫徹行動的初衷以及西安事變的前車之鑒，多少也是在暗示或提醒顧頡剛，因為顧氏的宣傳等活動，在得到中央黨部的資助後大有起色，在他本人眼中以及事實上固然相當成功，但在某些國民黨人

尤其是與朱家驊明爭暗鬥的二陳兄弟看來，却是偏離了軌道，中央黨部接獲控告呈文達數十起之多，指責其接近冀察當局，所編《大眾知識》，用紅色封面，內容雜左傾言論。朱家驊和葉楚傖對此也頗覺難以處置，遂由中央黨部函達顧頡剛，囑其申復理由。為了具體了解顧頡剛工作的實況，朱家驊乃乘傅斯年北上之便，托其就地考察。1937年1月7日朱家驊致函陳布雷：“西安事起，除即分電各地教育界友人力主正義，擴大宣傳，以領導青年外，并以平津關係特別重要，再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兄北上，因顧頡剛兄主辦之通俗讀物有《大眾知識》期刊一種，其名稱與封面顏色，弟早覺不妥，曾迭函促其注意，嚴防為左傾分子所利用。此次乘傅君北上之便，托其注意與頡剛兄再言之。頃得傅兄來函及頡剛兄托其帶來函各一件，另紙抄奉督閱。<sup>⑨</sup>就此推勘，頡剛究屬文人，容易受欺，心尚無他，除電約其南來詳談外，復函請楚傖先生從速選派妥人前往輔助，因此公疏於防範，不得不有人幫忙。前曾迭陳楚傖先生，伊已有意派朱雲光兄，頃又函請楚公即派朱前往。論頡剛學術及品格，確為不可多得之士，予以維護，妥為任使，國家必可有相當收穫。傅、顧兩函述北方情形，殊關重要，擬請於便中將兩函及弟之處理經過轉陳委座為荷。”

《大眾知識》的實際主持人為吳世昌，編輯有連士升、鄭侃嫻、楊績、張秀亞等。1937年1月8日，顧頡剛遵照朱家驊的指示，親自前往南京將出版物交有關部門審查，并進行申辯。12日，顧頡剛再度致函朱家驊解釋一切：自去年遵囑從事北方活動以來，已造成一種勢力，學生及民眾竭誠表示愛慕之忱，而攻擊者大至，一方面北平教育界對宋哲元頗無好感，誤會聯絡冀察當局使之勿脫離中央為顧氏個人活動，流言交集，一方面《大眾知識》編輯人急於吸收青年，雜有左傾之語，無以自解。擬具將來工作方針四項，（一）二十九軍中下級軍官及士兵抗日意識至濃，故通俗讀物社所編抗日唱本能在該軍內推行，此實造成精神防綫之唯一機會，不應放過。此後擬減少與冀察當局之接近，只在抗日一點上往來，因讀物銷入軍隊，非

得長官諒解不可。(二)刊物方面,已切囑編輯人鄭重登載,《大眾知識》之紅色封面已更換,編輯人員亦當改組,撰稿者擬改以各校法學院教授為主體,而將青年作品減少,確保此後不再有左傾色彩。(三)減少與青年接近。(四)對中央方面,應多事聯絡,凡中央派至北平工作者,擬一一與之識面,有疑難事,與之商量,一切工作,俱與公開;對中央之報告,每周發一次;中央對其工作如有意見,祈隨時宣示。

對於顧頡剛的解釋和改進意見,朱家驊表示滿意,希望其實行第四項,令一切傳言,不攻自破;嚴密注意第二項,“確遵主義,不涉其他思想,則接近青年,實屬必要。青年為國家基干,導之於正,黨國前途,得以利賴。中央所期望於學術界諸先進,關於此點,實較授與其他知識技能為尤切也。至與冀察當局往來,初非招謗之原因,要點只在誤會左傾耳。弟與楚儉先生同感困難,亦在此點。”并要顧頡剛“有暇莅杭一談”。此事的交涉清楚地顯示,在對日及地方勢力等多種因素考慮中,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最為關注的還是與左傾爭奪青年。

不過,在青年普遍左傾,且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況下,要想通過導入擁護中央的正軌來激發民族意識,多少有些不切實際甚至南轅北轍。顧頡剛的宣傳鼓動工作短期內收效顯著,重要原因正是順應了左傾青年的熱情。當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覺無法二者兼得時,寧可因噎廢食。據說“此事經各方磋商,僉主暫時結束,由中央黨部函達顧氏,停發工作經費。”這與朱家驊的態度大相徑庭。前後如此反復,很可能是因為驚動了最高當局,由最高領袖作出與主其事者不同的決斷而後者只能執行。

顧頡剛對於這樣的結果,自然不滿,於2月4日致函朱家驊,表示惋惜之外,請求補發積欠的工作經費。若黨部不能即發,祈暫由中央研究院墊付。這一要求,讓已經離開中研院的朱家驊多少有些難堪,他於2月6日復函道:“特殊工作費事,前接中執會財務處來函,要求更換正式收據,已復請逕行接洽,屆時正式收據送來時,即將中研院所出者注銷。請即與王毅侯先生接洽為荷。

至十二月、一月份經費,楚儉先生既經允發,當可即寄。頃又致函催訊,請其早予撥給。前王毅侯先生言,當黨部於歸還墊款時,曾向伊聲明,此款已停,故此時縱再囑撥墊,恐伊亦未必照辦也。總之,此事結果如是,殊為可惜,實非意料所及,徒使兄增加困難,方寸至為不安,負兄實甚,殊覺無顏以對,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喚奈何而已。北平各國立大學,年來主持正義,領導宣傳,殊可佩仰,尤以北大同人努力奮鬥,更屬得力。惟燕京以環境特殊,致兄之處境,較夢麟、適之諸先生,困難尤甚,自屬實情。為執事素抱熱忱,且精力瀰漫,夙夜匪懈,仍盼與教育界諸同仁同心協力,在共同主義之下,為中央繼續努力,以應付華北之危局,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此事雖然終止,朱家驊與顧頡剛乃至通俗讀物編刊社的關係并未結束。抗戰爆發後,通俗讀物編刊社輾轉於西北西南各省,除繼續編輯抗戰讀物、繪制抗戰畫冊外,與全國文協合辦通俗文藝講習會兩期,組織本社巡行工作團,演唱本社新詞,參加後方勤務政治部工作,擔任傷兵民衆宣傳與教育。然而,自遷到重慶後,因教育部補助數目過小,印刷困難,經費支絀,所有編成抗戰讀物畫冊150余種,先後交由合作機關印行,運送到渝者寥寥。為此,1939年1月6日,該社研究部主任趙紀彬持顧頡剛函前往拜會朱家驊,以後者“扶植本社歷有年所”而尋求支持,因朱家驊外出,未能見面。次日該社專函報告社務近況。朱家驊乃另行約期與趙會晤。<sup>⑩</sup>此後朱家驊對顧頡剛仍然有所倚重。

## 二 華北文化教育協會

抗戰爆發後,持續不斷的戰亂和遷徙,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生態,表面統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權的轄區內各派勢力的爭奪更形激烈。當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重慶穩定下來之時,就開始關注淪陷區文教界學人的動向,尤其是學人比較集中的北平以及還是孤島的上海兩地,希望在這些地區恢復和發展黨務。其目的—是避免學人為日偽所拉攏利誘,二是防止學人倒向左翼,保持國

民黨和國民政府正統對於學人及青年的影響力。

民國以來，北平文史學界與日本的關係持久而複雜。盡管英美留學生後來居上，留日學人在北京(平)學術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兩國學人不斷互訪學習考察，尤其是1920年代以後，所謂對支文化事業展開，北京一度是其規劃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後來雖然未能實現，改到日本本土，可是在北平還保留了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圖書館。由橋川時雄等人主持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先後撰著提要 and 負責整理的學人多達85人，以平津一帶學人為主。<sup>⑩</sup>中日學人之間的密切交往，在中日兩國的衝突對立日益加劇以及日本對華北的侵略逐漸加深的背景下，產生了錯綜複雜的影響。民族大義與學術無國界形成相當程度的緊張。如何處理正常學術交往與堅持民族氣節的關係，成為北平學人兩難的抉擇。

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學人運動將北平設為“文化城”，“平日最反對外國人”的北京大學的馬衡等人還前往南京游說，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贊成，稱此“實為中國讀書人慚愧也”，雖不便公開反對，還是私下勸告，并向南京方面表達反對意見。<sup>⑪</sup>《塘沽協定》簽訂後，傅斯年不惜與贊成妥協的胡適斷交，堅決反對對日妥協。1935年冬，土匪原來北平，勾結蕭振瀛等漢奸，制造其所謂華北特殊化。彼時中央軍與黨部撤去久矣，據說胡適等人奮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組織起來以抵抗之，卒使奸謀未遂，為國長城，直到七七。<sup>⑫</sup>

稍後，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的橋川時雄主持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開始運作，“北平盛傳北平圖書館諸公皆與東方有撰稿之關係，議論紛紛。”袁同禮深以為慮，詢問傅斯年如何了此一事。傅建議“莫妙於分頭一談，以前不必說，以後不再作。”於是二人乃分別一一訪談，“反轉陳說，幾至零涕，幸承諸位友人不棄，終於意見一致。”問及此事如何發生，則皆謂自王重民始，又多謂自王重民介紹，於是傅斯年再三托袁同禮函勸王重民早日結束。北平學人參與日本方面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有的不過是為了生活，傅斯年等人知道“此事本非大事也”，所以堅決反對中國學人參與，就大局看，是因為“坐失四省，不能無所

感動，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標榜，故或以不作為是。”據說“當時有一位友人詢陳寅恪先生以此事之可作否。寅恪先生云，如以為可以公開，則作之；如不以為，則不可作也。”傅斯年深感此言恰如事理之平。就個人看，王重民的學問、聲聞，後來必有大進於實務學術之進步，“而貽人以此小口實，則萬萬不值。”所以傅斯年有分外之關心。<sup>⑬</sup>

七七事變後，雖然大批學人輾轉遷徙到大後方，仍有不少人為了各種原因滯留故都。迫於時勢，加上戰前與日本的種種淵源，不可避免地產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參與各種偽組織的活動。日本方面，隨着戰綫的延伸，必須維持後方治安，消弭中國人的所謂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需要武力以外的文教協助。1938年8月，日本動員了代表該國現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餘名組成代表團來到北平，成員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貴族院議員，帝國農會長)、慶松勝左衛門(前東京大學教授，藥學博士)、宇野哲人(東大名譽教授，文學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學教授，文學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學教授)、赤間信義(日華學會理事)、森島庫太(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醫學博士)、鶴澤總明(前明治大學校長，法學博士)、安藤廣太郎(農事試驗場長，農學博士)、小林澄兄(慶應大學文學部長，文學博士)、鹽穀温(東京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常盤大定(文學博士)、正木直彦(東京美術學校名譽教授)、伊東忠太(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工學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文學博士)、森田實(前神宮皇學館長，中央大學預科長)、中井猛之進(東京大學教授，東大附屬植物園長，理學博士)、北島多一(慶應大學醫學部長，北里研究所長，醫學博士)、原田淑人(東京大學教授)、平賀讓(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工學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國大學名譽教授，理學農學博士)、林春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醫學博士)、宮川米次(東京大學教授，傳研所長，醫學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學校長)、橋本傳左衛門(京都大學教授，農學博士)、林毅陸(東亞同文會理事，法學博士)、增田胤次(東京大學教授，醫學博士)、加藤武夫(東京大學教授，理學博士)、長谷部言人(東北帝國大學教授，醫學博

士)、島峰徹(東京高齒校長,醫學博士)、那須浩(東京大學教授,農學博士)、永井潛(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醫學博士)、岩住良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農學博士)、江角金五郎(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長)、小柳司氣太(國學院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宇田尚(東京女齒校長)。

8月30日,在中海懷仁堂舉行了所謂“東亞文化協議會”成立典禮及第一次大會,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湯爾和、何其鞏、周作人、夏蓮君、王謨、鮑鑒清、龐敦敏、黎世衡、文訪蘇、文元模、張愷、張鼎勛、李泰、阮尚介、陶尚銘、徐佛蘇、王家駒、張大千、吳家駒、許修直、梁亞平、馬鄰翼、張心沛、孫人和、錢稻孫、繆斌、余晉齋、錢桐、朱華、宋介、柯政和、陳垣、傅增湘、刑端。該會宣言號稱要中日兩國人士“以傳統之明倫親仁為本,擷西學之萃以資利用厚生,庶幾蔚為更進一層之新東亞文化”,其規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興東亞文教為目的,實則得到日本軍部的一致支持,目的顯然在於建立和穩固軍事統治。<sup>⑮</sup>

三個月後的1938年12月1日,東亞文化協議會又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舉行第二次大會,偽臨時政府教育部長、議政委員會委員長湯爾和率21名協議員前往參加,會議除增加評議員、理事、正副部長等職員外,還設立總務、文學、法經學、醫學、農學、理工學等部,決議兩國學術機關密切聯絡提携,予以適當的組織形式;協同調查研究中 國教育機關的創設擴充;恢復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設立北京自然科學研究所等。這次會議的背景,是日本急於恢復占領區的治安,以配合廣東、武漢的戰事,並將對中國的態度由單純破壞的“長期膺懲”轉變為“長期建設”,以建立穩固的殖民統治。<sup>⑯</sup>文教工作自然成為重點。

為了改變不利局面,國民黨通過潛伏在北平的黨務人員爭取由沈兼士出面,進行組織聯絡。1939年8月18日,國民黨天津黨部王若僊(化名吳世仁)致電中央黨部,轉達北平市黨部高挺秀關於平市黨務文教青年工作的報告,其中第一條就是:“沈兼士、張懷、英千里、張重一諸教授前曾以友誼關係密切聯絡,協助文教青年工作。近將尊電轉告沈先生後,工作關係愈益緊密。頃與沈先

生協商,擬羅致輔仁、燕京、中法諸校教授及平市中小學忠實教職員,組織文教團體,由沈先生主持,由挺秀任日常事務,以推廣工作。關於工作方針、工作用費及中央通信辦法,祈指示遵行。”為了訓練青年及文化工作人員,舉沈兼士、張懷、英千里商定,由輔仁大學以訓練偽教士為名,收納各中央機關反法團保送學生40名,普通教育功課由該校教授擔任,思想指導及技術訓練由高挺秀擔任,秘密實行,一年為期,畢業後分派各地。<sup>⑰</sup>

北平淪陷後,沈兼士受教育部委托維護輔仁大學校務,滯留北平,與同仁輔仁大學秘書兼附中主任英千里、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取顧炎武的炎,以示抗日。<sup>⑱</sup>朱家驊指示平津黨部協商呈核有關事宜。9月17日,王若僊電告結果,“沈兼士先生為網羅人才,增厚力量,平津應為一體,須密切聯系,以利工作。”初步計劃為:甲、組織:(一)定名為華北文化教育協會。(二)干部委員15人,北平9人,天津6人,會設北平,津立分會。(三)內部分高等、中等、初等、社會教育四組。乙、工作:(一)吸收思想純正之各級學校教職員及文化機關工作人員,預計半年內可發展至300名。(二)平津各辦中心小學兩處,中學一處,以收容教導各方救國工作同志之子弟為主要任務。(三)救濟平津各校院及文教機關堅貞不附逆之高級人員,以介紹工作為主,津貼為輔。(四)選派忠實同志參加偽教育機關,從事破壞擾亂工作。(五)輸送忠實青年參加游擊區及後方工作。丙、費用:(一)會務每月500元。(二)被困文教界同志臨時救濟費每月1500元。(三)中心中小學津貼每月1000元,中學生100名,每人每月4元,小學生300名,每人每月2元。中央黨部很快於9月23日第61次黨務委員會會議通過,朱家驊批示由沈兼士負責辦理,積極進行,但須注意嚴防共產黨與人民陣綫分子混入。<sup>⑲</sup>

華北文教協會立案後,天津方面進展順利,依照總會規定,於1939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分會,委員6人,為趙伯陶(化名郭若泉,亦化名元正之)、路秀三(化名李茂林)、伍克潛(化名吳蒿齋)、劉仁(化名金友仁)、賀翊新(化名田天池)、徐石公(化名鍾靈生),推趙伯陶為主席委

員，路秀三爲書記，分調查、救濟、教育、宣傳四組，由委員兼任各組組長，具體爲：路兼調查，徐兼救濟，伍兼教育，賀兼宣傳，均無薪酬。每月經費，與平方商定，各1500元。<sup>②0</sup>

北平總會的成立，却一波三折。此事發端，高挺秀等人似乎并未與沈兼士充分協商，甚至事先可能并未得到後者的同意。1940年1月5日，高挺秀（化名喬翔遠）電告朱家驊文協經費收到，“當商承沈先生努力工作，雖環境日艱，計劃尚可逐漸實行。”其時北平日偽拘捕文化界人士多名，雖因證據不足，牽連太廣，缺少補充等因素，旋捕旋釋，畢竟造成人心動蕩。加上北平與會者多係現任教職員，所以文教協會與國民政府教育部駐平負責人聯絡問題，擬在保持秘密之下謀取協商，以免洩漏人名，傷害與會學者生命。1月25、26日，高挺秀接連致電朱家驊，告以收到華北文教協會經費，已向沈兼士報告經過，商討進行。“不意有人聞悉本會名稱及負責人姓氏，遂妄加意會，函知平方某等局外人，風聲宣泄，甚至自稱委員，逕向沈先生接洽。先生以身處淪陷區域，現任教職，殊覺不安，乃不願有所組織，只囑職每周會談一次，相機量力，有所貢獻。……今津方分會業已成立，平方尚未正式組織，而抗日遺族子女、優秀青年學生及文教界不屈不淫保持氣節之士，亟須救濟，事實又不容陷於停止。經職再三向沈先生勸駕，先生以愛國確有熱忱，而現實環境不能不顧慮，再與諸關係方面分別研商，一部主張詳爲斯種工作實迫切需要，中央決不能因人事而牽動功令，應另推委員代理，大膽做去，以副中央之期望；一部主張則認爲事已被泄，危險莫測，應及早解消組織，停領經費，以息風聲，及相繼工作另起爐竈。處此情形之下，職對經費既不願自爲支配，工作亦不敢貿然推動，究宜如何辦理之處，用特電懇訓示祇遵。”高挺秀又提出，爲了保證沈兼士的安全，“可否由部長直接函沈先生一部高教工作職密秘供其驅使，一者避免電經津方，被局外人宣傳，礙及沈先生安全，一者隱合沈先生另起爐竈之意。至於文協會則再補充一二新人，仍繼續工作，爲國建樹廣泛力量，形勢變化，自可減少注意矣。”<sup>②1</sup>

朱家驊接電，覺得事有蹊蹺，指示查明詳情并電示高挺秀：“文教協會前據吳電，由韓季通先生主持，而兄任日常事務，此間會議時，將原電傳觀，因中央同志多稔韓先生，聞其願出來主持，均極欽佩，此項經費始獲通過。此次又何以遽爾移交？查該會既歸韓先生主持，則平津兩地委員人選及經費支配諸大端，均應由渠決定，爲顧慮環境計，可請其稍斂形迹，總持大綱，而責成其他忠實有爲之同志分頭執行。所陳派員代理及解消組織，均非辦法。蓋一易人則與中央諸同志原意相違，恐有異議，且文化教育界工作，須得學術上極有聲望之人領導之方能推動。”并要求用款須按原定方針，不能挪移；對青年學生應以正義感召，多做人格熏陶，若專恃金鈔張羅，不但無以持久，反爲青年所鄙視。又專電沈兼士：“平津爲舊日文化中心，敵僞誘脅方急，青年學子，萬不可無人領導。會事務請積極進行，此間諸同志企仰正殷。”<sup>②2</sup>

沈兼士托人帶給朱家驊的兩封信，說明了出現周折的原因，一封寫於1月10日，函謂：“一、開學後曾送一批畢業生南下服務。在校內創刊兩種雜誌，以資聯絡。一、暑假內中外神父及學生均有被捕者，校中被監視偵探極嚴，近兩月來外間被破獲之機關者多，故計劃頗難運行。一、喬君前曾囑組織一具體機關，一時甚不易辦到。理由已告喬君，請其轉達。一、鄙意仍與去年所上之書相同，盡國民之本分，盡可能之範圍，爲國家效力，不預受任何名義及任何報酬，保持獨立自動的活動。一、此間風傳天津有人組織一華北文化教育協會，由弟領銜，承受中央經費每月三千元。此事弟絕未與聞。近來竟有人（不止一次）到校及舍下詢問此事者，燕大同人亦有傳說此事者。兩月前曾托喬君赴津調查，并聲明不願參加之意見。惟近來風傳更甚，頗覺不妥，極盼尊處能爲一查。一、喬君已兩月余未晤，不知目下是否仍在平？弟意直接通訊最好，否則須由一固定而且慎密之人轉達亦可，但決不願與團體發生關係。此種不得已之苦衷，乞諒之。”

是函待發之際，高挺秀從石家莊回平，沈兼士和張懷等即約與晤談，了解情況後，沈兼士再附一函：“一、聞喬君之報告，始知華文會之經過，

極佩盛意。惟本弟前信之原則，及現在北平之環境，與喬君及英、張二君仔細商酌，均認為華文會現在平已有滿城風雨之勢，決不能利用之以資活動。一、弟等仍本前議，進行一切，而不參與津局。因顧慮環境，瞻望前途，苟不如此，將來恐一事無成，而有絕大之危險。一、弟等不須有組織，只擬相機量力，隨時有所貢獻。至相當時期，自當報告(或由喬君，或直接)。一、經費一層，現在無此須要。將來如有事業需費時，自當直接請款。一、如有賜件，請勿由津轉此(直接來函亦極不妥)，由于主教設法交西友代遞最妥。”<sup>23</sup>

在高挺秀的勸說協商和朱家驊的慰藉之下，沈兼士終於同意出山，北平方面重新部署，沈兼士化名章毓庵(分用則毓指沈，章指張懷，庵指英千里)，高挺秀新改化名葛方(分用則葛指高挺秀，方指施天牟)。要求朱家驊介紹平方電臺關係，或建立專用電臺；在平方不能直接通電之前，請朱家驊直接賜下專用密碼交沈兼士。<sup>24</sup>3月，沈兼士致電朱家驊，表示華北文教工作若准備計劃得當，自能生效，“然一切工作總以各方嚴守機密為不可缺之條件，前者文協事已由津方洩漏，傳播平方，以至外人竟有以文協與弟名作為談資新聞。於此險象環生之下，弟等自無法擔任。此後因葛君之盡力與弟等熟商，弟為工作便利及安全起見，須改變方法，茲將鄙見列下：(一)文協名稱已公開，弟等處此環境，不有此名義，實際亦能便於工作。(二)平津兩方精神雖屬一致者，工作則宜分行。故此後平方之事不須令津方與聞，且中央必須備有與平方直接秘密通信辦法，方敢負責進行工作。(三)在中央未能直接與平方通信而須借用津方轉達消息之前，請勿明提弟等之事。(四)為防止耳目補救善後起見，中央似可對津方聲言弟等已不就文協事。”<sup>25</sup>朱家驊同意遵照辦理，電告天津方面沈兼士不願主持，會務另簡委員接辦。<sup>26</sup>并再度致電沈兼士：“近歲文教界思想龐雜，久不聞名節之重，幽燕一隅為舊日文化中心，士風隆替，所關非細，領導□流，策動抗戰，先生是賴。”<sup>27</sup>

北平黨部電臺遭到破壞後，與重慶方面的聯絡須由天津代行，不利於保密，沈兼士堅持與中

央直接聯系，主要是為了保障安全，便於開展工作。在文協領導下，重新組織了原來青建社中對於學術意趣濃厚及實地從事教育工作者。<sup>28</sup>經此一番折騰，北平文協總會實際上并未正式成立，因此再度引起糾紛。此事背後，可以看出平津國民黨各方機構爭權奪利的影子。5月15日，文協天津分會以“平津兩會積極推動，需款甚殷”為名，催撥三、四月份經費，并報告該分會成立以來工作概況，據稱成果有如下幾項，一、救濟：津貼各級學校中抗日遺族子弟及思想純正學行優良的貧寒學生，分別為工商學院8名，每人月給15元，中學生29名，每人月給5元，小學生38名，每人月給2元；酌送文教界堅苦貞守貧居不與敵偽合作之士獎慰金，“以示中央顧念之意，并激勵其節操”，被資助者有前天津教育局長鄧慶瀾，津市立師範校長李審侯，北洋工學院教授張毓恂、弓[?]廣奎，河北省立女師學院訓育主任趙子豐，河北省立商職學校訓育主任李柳範。二、輸送青年(共3人)及教授(北京師大楊宗翰)到後方讀書工作，補助其旅費。三、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接辦匡時小學一處，天津分會每月補助1000元，作為中心小學。四、派員赴河北省內地之縣分，在教育界發展優秀分子，以鄉村小學為樞紐，宣傳中央意旨，增強民族抗戰意識，已有基點20處。五、敵特務機關唆使偽新民會在天津租界內組織和平興亞救國會，文協天津分會分別聯絡有力量之學校，務使消極的不合作，頗有效果。<sup>29</sup>

朱家驊接電，頗感疑惑，既然已向天津方面聲明沈兼士不參與此事，北平總會既未成立，天津分會則無從談起，何謂平津兩會積極推動？恰好此時中央秘書處接到4月28日北平市黨部來電，指文協會一事為“藉名義以便私圖”，并提出該黨部“原設有文教委員會，除派執委一員為中心委員外，請教育界名流之愛國分子擔任委員，共策進行，以往工作尚著成績，如再增加相當之經費，其發展可以預期。”要求停發文教協會之款補助文教委員會。據說教育部所派之平市教育督導員亦贊同此舉，願加入該會擔任委員，共同負責。<sup>30</sup>而教育部方面也接到派駐華北戰區督導教育人員報告，希望文教協會與之密切聯系，統一



步調，推進戰區教育事業。教育部遂行文中央秘書處，要求指定機要人員常川與該部會商此事。<sup>⑳</sup>中央秘書處鑒於文教協會的成立及經費獨立“已引起黨部本身之分化與攻訐，似應設法調整，以免醞釀更大之危機。按教育部既有推進戰區教育文化之整個方案，且派有專人在彼主持，華北文化教育協會之工作推進，似可劃交教育部督導，以免機關林立，統屬不明，事倍功半，而款歸虛糜。至中央核定之經費，擬即停止，由教育部所派督導人員依據實際情形及需要數目，另擬預算，呈請教育部撥發。”此事在朱家驊任內核准，秘書長葉楚傖遂請其設法查明文教協會工作狀況以及沈兼士是否實際主持其事，并征詢關於教育部華北督導員與該會聯絡的意見。<sup>㉑</sup>

後來中央秘書處、組織部與教育部協商結果，教育部表示有統一指導的必要，惟戰區情形與平時不同，指導方式需按實際情況而定，最好每半月或一月由主持方面派專人會談一次，交換情報，再確定以後動向。此法實行一段時間，因會談者對華北情形及文教協會淵源不甚了解，效果不佳。組織部秘書沙孟海鑒於北平總會迄未建立，天津分會便成似是而非，建議若有適當人選，可將分會劃出獨立辦理或改歸聯處負責；另外平津兩市黨部教育會與文教協會職權衝突，應有所指示。<sup>㉒</sup>

其時，天津方面再度報告平津文協會工作實情，據稱“北平文協工作，對外揚言停動，實際經沈公決定，津方只與職（按即趙伯陶）發生聯系，并守秘密。津方同志咸認沈公已不負責矣。每月經費由職密轉喬同志，所有中央匯款辦法，曾經職與王任遠同志商妥，由青年團關係方面匯轉，并請秘書處與沈公定有密碼，一切不經津市黨部轉也。此皆為便利沈公，以免稍有泄露。頃喬同志又來津，沈公囑征詢津方工作情形，以期一致。此平津文協會工作之實情。”<sup>㉓</sup>朱家驊接到各方面的不同信息，對文教協會的實情進一步懷疑，於是密電該會發起人王若儂，詢問詳情，以便決定是否繼續撥款，并考慮改換天津分會負責人。王若儂在該會發起之際一度失去自由，接電後報告：“查文協成立後，復生即無法照管，致有糾紛，

其主持人或有不善處置之處。惟文協工作自屬重要，今後似可令平津市黨部負監督之責。……查文協各委均係一時之選，惜因由喬、郭所招致，實際上各委均不甚負責。此後擬請由公直接委派津分會人選。”并對天津分會人事提出具體意見。<sup>㉔</sup>中央組織部隨即按照這些意見對天津分會進行改組，由賀翊新為主任委員，趙伯陶為副主任委員，教育部督導員郝任夫增補為委員兼秘書。

北平方面，9月初沈兼士、高挺秀、張懷、英千里等人聯名提交工作報告、預決算以及計劃，據稱：“同志原有之組織，其工作因1、去夏某校中外教職員被捕，2、南下學生被捕，3、平津中央機關迭被破壞，不得不取奠定基礎相機復進政策。今春葛君轉達尊意，當時因津方舉措失慎，消息致被泄露，弟等力不從心，未能遵命辦理，至為歉仄。後由葛君與弟等再四會商，并電得公同意，脫離津方，另組進行。……半年以來，漸告成熟。暑前三青突被破獲多人，又不得不暫行停頓。現在風聲仍甚緊急，開學後當再徐圖進展，此經過之大略也。”交通綫問題，“凡通訊及匯款仍非經由津方不可，實感不便，且有危險性。”日前英千里赴滬成立聯絡處，將來寄款便利，隨時直接通訊則尚無辦法。北平總會暫以委員會為首腦機關，下設干事及工作員，委員四人：沈兼士、張懷、英千里、高挺秀，沈兼士為主席，高挺秀為常務，負責計劃主持及推進一切工作。干事承委員之命，執行各項工作，由四名干事分任聯絡消息及文書、事務及會計、組織青年團體、駐滬聯絡等。擔任干事的有郝德元、常惠和葛信益。<sup>㉕</sup>工作員輔佐干事，分任各項事務，共二人，一任收支，一任交通。該會“以聯絡操守忠貞之士，網羅有志青年為主旨”，從事下列活動：1、組織學術團體，已成立中國語文學研究會（沈兼士主持，聯絡國學家及優秀學生，研究中國固有文化，藉以引起國家民族思想，并堅定其自信力）、中小教育研究會（由張懷及外圍同志余君主持，聯絡教育學者及中小學教員，研究建國教育方法，逐步實驗，以抵制奴化教育）、文藝社（由英千里主持，為使青年得有正當讀物，在輔仁大學名義掩護下發行刊物二種，一為純文藝刊物，即《輔仁文苑》，已出四

期，一為綜合刊物，即《輔仁生活月刊》，已出八期）。2、利用臨時集會，進行宣傳，已舉辦美術展覽會、攝影展覽會和輔仁大學校友返校節。3、組織青年團體，以操控各大學中學及破壞敵偽各團體，已成立清儉學社（即青年建國學社）、亭林學社，前者由高挺秀負責，就原有團體改組，高任書記，下設社務、事務、助理，成立集體單位五，樹立個人中軸七，具體活動為破壞敵偽青年黨，調查自學會，輸送有志青年南下，指導中學生升學，調查敵國內情形及協力外圍之學術團體等。後者由華奇負責，自去年開始活動，主要工作為聯絡北平三校同志組織團體，介紹人才南下服務，利用實驗室制造特種藥品。

該會於本年寒假接辦北京學校，“一、因奴化教育於血氣未定之小學生最有危險，思有以救濟之。二、利用之以為工作之總機關，即以本會委員加入該校校董會，為推動工作之主干”，由干事擔任總務和教員，“造成便利工作之環境。三、藉以聯絡各中小學，擴張抵制奴化教育之工作效能。”已聯絡9所中小學，其中鄉村小學尤為直接有關。此外，該會還隨時調查操守忠貞思想純正的教員學生公務員等，予以介紹職業，補助前往西南西北大後方服務就學的旅費生活費等救助。至於今後計劃，該會除繼續進行上述各項工作外，為加強效能，擬開展如下工作：1、調查登記在平各項專門人才，報請中央征用，一面密切聯絡，促使自動南去服務國家，一面代籌南行路線或資助旅費。2、擴大青年救濟及組織訓練，養成抗戰建國之有用人才，免被敵偽收買利用。3、建立學術報國陣綫，於各大學選定思想純正、資望隆重之學者，聘為委員，建立中軸，分頭聯絡同志，加以組織，鼓吹學術報國，造成普遍風氣。4、搜集淪陷區之新聞，調制有關本會工作的各項統計表，以備研究運用。5、宣傳敵人陰謀及酷虐行為，喚起一般民衆之敵愾意識。<sup>⑩</sup>

10月，國民黨北平黨部電臺恢復，負責的蘇麟閣（化名趙志誠）受托了解文教協會詳情，向朱家驊報告：“自職到平後，即與沈兼士見面入手，所有經費，均已收到。惟因為慎秘計而免去橫的關係，對外竭力否認，并曾托司徒雷登、德領事及

在滬托人共三次報告，近又托德領諾爾曼帶去之工作報告，想造詣垂簣。嗣後凡關華北文教協會之電，均由職臺代發，取得相當聯系，請釋念。并將調查平津文協情形陳述如左：（一）華北文教協會，平為總會，津係分會，平津以沈為主任委員，高挺秀為常委，英千里、王之相、張懷為委員，以青建學社及亭林學社作該會之外圍組織，每社約純潔之會員五六十人，青建學社由高負責，亭林學社由祝福祥負責，更辦有小學二處，工作頗活躍。津會先由趙伯陶任主委，因趙與王與青及沈同志均有相當交誼，工作聯系頗佳。自由賀翔新負責後，沈同志為自身安全計，在技術方面不願與津文協再生聯系，同時津會及教部工作人員均思把持華北文協會，而要求加入，并流言釣座只認私人而不認組織之蜚語。懇釣座分別指示，責以事有專責，不得干涉攬奪。華北文協之事，令其自行向外發展，免去內部磨擦，俾沈同志仍可安心進行工作。（二）沈同志決免去橫的關係，願直接受釣座之領導，以免自身發生危險，有礙工作。（三）華北文協之經費原為三千元，平津各千五百元。現為秘密計，請各別分寄。（四）本年下年度北平文協之預決算，沈同志要求平市每月增為三千元，俾便貼補平市之貧苦學生，而求工作進展。（五）現國幣在華北跌價尤甚，貼水事亦懇釣座擔負此項損失。”<sup>⑪</sup>朱家驊接報，認為“華北文協工作，北平較天津為重要”，將天津分會預算減為每月一千元，北平則加到2500元。<sup>⑫</sup>并且不顧天津方面的不滿和中央財政的困難，堅持要有關方面設法滿足。可見其對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極端重視。

### 三 組織文史雜誌

經過上述調整，華北文教協會的發展進入相對穩定期，但是平津兩地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機關的關係以及地下工作的保密規則仍然未得到適當處理。1941年春，北平市國民黨黨部改組，英千里等人因為要改就黨部書記，退出文協，北平文協總會不得不再度進行調整。為此，高挺秀潛赴重慶匯報，沈兼士則致函朱家驊，并提出會務報告，函謂：“平市改組，耿、英兩君之新任務，因津

方傳播，此間局外人已有所聞，而各同人探詢消息。褚君頃與弟等商酌再四，覺處此艱危環境，原來之行醫計劃，非變更不可。現正設法另立社會基礎，俟成功後，即當進行一切。……再英君前請尊處電津，宣布彼已辭職，藉獲掩護，乞速飭辦。董洗凡君經弟邀請，已允加入本會工作，化名丁伯強，擬請予以文委名義，俾便合作。”<sup>④</sup>朱家驊同意沈兼士所請各項，并批示復電：“平市文教工作重要，務請設法大規模擴充”。<sup>④</sup>

4月7日，朱家驊再度致電沈兼士和褚成猷：“平市為昔日文化中心，淪陷以還，學人志士仍多息影其間，敵偽注意誘脅，不遺余力，浸漸移變，不無可慮。故我方文教工作較之其他省市尤關重要。現任或曾任各級學校教員及畢業肄業學生，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啓迪聯系及如何發揮其力量，以為他日收復失土張本，正有待於諸君子之繼續籌劃進行，北望燕雲，神與俱馳。”

朱家驊連番催促，并非一般的鼓勵督促，而是迫切希望北平方面於短期內有大動作。由於未見北平文協回復，4月25日，朱家驊再發一電，除了表彰北平文教協會在沈兼士領導下“收效及宏”外，主要是提出：“茲為加強工作起見，擬在平出版文史雜誌或文藝刊物，以吸收第一流作家，使其能掌握華北文壇，隱約之間，灌輸民族意識，暗示本黨主義，并另出版一普通周刊，以吸引青年作家與優秀學生之稿件。擬請兄負責籌備，擬就預算，即行開辦。”

以創辦刊物的方式影響戰時文教界學人和青年，并非由北平開始。一年前，在上海時任暨南大學校長的何炳松接到中央視導學校黨務、“網羅人才，補助生活於學術商榷”<sup>④</sup>的指示，“日夕考慮推進工作問題，深覺在此間推進黨務，既不能公開活動，而文教界中人又非僅口舌討論或酒食酬應所能搖動，或改變其立場，加以此間文教專家亦不盡均在各校任事，聯絡更難普遍。故愚以為謀黨務之發展，莫先於文教界同人精神之聯系。而精神之聯系方法固多，然莫要於學術問題之討論。而以創刊一種標準較高，內容較富之月刊為其主要之重心。在專家方面，既得有發表研究心得之機會，又復可藉優厚之稿費，以補助其

艱困之生活。而在主辦人方面，亦可收聯絡感情、網羅各科專家之明效。刊物本身如果標準甚高，亦大足貢獻於吾國學術之進步，間接并可轉移全國學者及青年學子之趨向。吾黨如欲在文教界謀長足之進步，似以印行有價值之刊物為目前要圖之一。近代《財政評論》之印行在學術界頗占地位，隱然成為吾國財政學界之重鎮，即其明驗。以往吾黨亦常化巨大之經費印行各種定期刊物矣，然成效不著，蓋主持者過重於宣傳，與研究學術異趣，故不為時賢所重。且因初無永久計畫，往往虎頭蛇尾，所謂乘興而來，興盡即返也。此外，并因內容文字多屬空洞無物之作品，無法引起青年之興趣，更無望獲得國人之高重。吾人若果發行刊物，必盡力矯正以往之缺點，為吾黨樹一文教界之新幟。”

根據自己的認識和以往主辦銷量達五萬份的《教育雜誌》的經驗，何炳松提議創辦《中國學報》月刊，取其範圍較廣，“且暗示黨國主辦之意”；以社會科學為主；每期20萬字；編輯7-9人，以住在上海者為限，特約編輯100-120人，延聘國內各科專家擔任，每期版權頁上全體列名，以示負責而資號召。如此，“將來學校黨務之推進，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sup>④</sup>次日何炳松再函朱家驊，告以“偽方近已出有一種專門研究學術之月刊，表面上不談政治，想藉以引誘各科專家代為撰稿，稿費聞極優厚。”有鑒於此，他認為辦刊一事更有考慮價值，并擬請朱家驊、陳立夫、王世杰三人為名譽編輯。<sup>④</sup>

朱家驊接函，於6月3日轉告何炳松來函的大意於葉楚傖，認為“此項建議如能推行著有成效，既符政府收羅人力之本旨，且於研究學術之中推行黨務，可使國內優秀分子悉心內向，無異充實本黨之力量，兼能為黨樹一文教界之新幟。”葉楚傖對辦刊一事深表贊同，但鑒於國民黨中央財務狀況無法撥款，宣傳部方面亦有困難，希望與教育部陳立夫協商解決。<sup>④</sup>朱家驊認為：“該刊之發行，事關主義之闡揚，以與異黨鬥爭，在今日之上海，實屬特別需要。得柏丞兄主持，當必有成績可期。最好能在戰地經費節餘項下指撥一款，較為妥善，且得以從速進行。”<sup>④</sup>由於1940年度戰區經

費預算分配無餘，不能按月撥款，遂在1939年度該項經費節餘項下一次性撥款4萬元。<sup>④7</sup>

該刊實際創辦時，定名為《學林》，“出版以來，頗得國內專家之合作，與青年讀者之歡迎”，堅持一年左右，何炳松請求繼續撥款兩萬，否則結束。因為據說“內地同志中對此事頗有微詞”，“為避免誤會計，似以早日告一段落為佳也。他日交通較便，時局較定時再行續辦，確足謀聯絡文教界同志之感情，提高學術研究之興趣也。唯自《學林》印行以來，國內能文之士（北平、昆明、重慶諸地均有投稿人），確獲得不少生活上之補助。如予停刊，似宜別求簡便救濟之辦法。”何炳松的提議是：每月籌一、二萬元的款，收購國內專家之專著，俟時局大定後為之印行，似亦網羅人才之一道。此外，何炳松還通過朱家驊獲得特別講座津貼兩萬餘元，設立學術講座，延聘滯留上海的學者，新的學年將至，也希望繼續獲得資助，即使款項減半，“亦勉可補助一部分值得優禮之賢士”。<sup>④8</sup>

此時內地文教界人士對羈留孤島的國立大學不及早內遷嘖有煩言，以為在此任事者為苟且偷安之輩。實則何炳松等人每學期都呈文要求內遷，教育部鑒於在孤島的其他國立機關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只有國立院校尚在埋頭掙扎，要求其堅守崗位，不允任意撤退。面對內地同行的誤解，盡管對於辦刊物和學術講座何炳松都作了結束的準備，他還是強調：“自《學林》與講座兩事實行以來，本黨在此間文教界之信譽似頗有所增進，將來公開整理學校黨務時，必可較能順利進行。蓋精神上既獲得聯絡，則形式上將不成問題也。唯以往本黨行事，每每舉棋不定，隨作隨輟。不特旁觀者為之失望，即身負工作之責者，亦不免因之灰心，見有應為之事亦不敢毅然自任。故愚以為如《學林》之印行，不特不宜中止，且如上海局勢不變，並宜擴大積極進行。”<sup>④9</sup>

這樣的方式在大後方也予以採用。1941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擬在重慶創辦一份文史半月刊，發表學術論文，“以左右一時風氣”。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驊再次想起顧頡剛，商得葉楚傖同意，擬聘顧到重慶主持其事，每月經費五千元。

⑤0開始顧頡剛以夫婦二人身體欠佳、主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無法脫身、以及少有可用人才為由，要求延遲半年再說。<sup>⑤1</sup>後因朱家驊一再堅持，顧頡剛又與蕭一山商議，“中國各種學術俱有學會，惟史學會尚付闕如，擬即着手組織，俾作文史半月刊之後援。”請朱家驊協助。並希望能在成都進行編輯事務，以利用當地人才集中、圖書豐富之便。<sup>⑤2</sup>朱家驊對於組織史學會以作文史半月刊後援一事深表贊同，力助其成；而編輯地點，因文史半月刊由中央黨部主辦，則堅持要顧頡剛“常川駐渝，襄助一切”。<sup>⑤3</sup>

後來顧頡剛果然到重慶主辦《文史》，前任副社長（社長為葉楚傖），再接任主編。社中職員先後有楊效曾、吳錫澤、顧良、魏建猷、周春元、史念海等。只是再度遇上類似的麻煩，1942年2月，有黨務人員指控“奸黨吳錫澤等，竟利用《文史》雜誌社為掩護機關，建立組織。該吳雖身為《文史》社編輯，近乘該社社長顧頡剛先生離渝期間，大肆活動，往返於沙磁路上（該社現在柏溪），匆忙異常，所作何事，自不難明了。請再派人徹查，速作斷然處置，以免患生肘腋。聞《文史》社系由部座扶植而立，今竟被奸黨利用，殊覺痛心。”<sup>⑤4</sup>後來證明，吳係“被人誣告為跨黨分子，經先生（案即朱家驊）查知其枉，令其到部供職，以資洗刷。當於四月中到部。”<sup>⑤5</sup>後來國民黨以該雜誌無關於主義宣傳，加上戰時財政困難，物價飛漲，一直不能足額支持，靠顧頡剛個人苦撐，根本起不到預期的作用。1944年4月，國民黨黨政考核會即擬停發經費，1945年1月，中央黨部終於停止財政支持。<sup>⑤6</sup>

上海、重慶的成效，令朱家驊等人對北平的期待更加迫切，可是北平方面對於中央的提議和再三催促，遲遲沒有反應。6月3日，朱家驊復電北平：“至文化工作，應積極進行，全力以赴。請辦刊物二種，已詳前電，希即照辦。提倡民族思想，暗示黨義，轉移文風，創造新精神，至要。”6月7日，朱家驊請秘書室沙孟海發電北平方面催問，並於6月9日致電天津轉沈兼士，“盼將籌辦詳情電示為荷”。6月10日，沈兼士等提出新的工作概況報告，“（甲）人事，曾聘委員二人，丁伯強主持敵偽

內綫及交通工作，景魯生主持鄉鎮教育救濟及培植抗敵師資等工作；更換工作員一人，應靈另就他業，改派莊友霖補充，活動學術團體均有進展。(一)中國語整會會員增加學術講演，每月兩次，刊有講演集。(二)中小教員會聯絡同志多人，作種種調查及準備，并擬辦夏令師資講習會。(三)文藝社原辦刊物，繼續發行，文藝刊物已出七期，約八百份，編輯人七名，綜合刊物已出十五期，約千余份，編輯人十一名。青年團體：(一)清儉學社年來損失甚重，現擬暫維現狀，徐謀開展，詳情請葛同志面陳。(二)亭林學社，除聯絡三大學同志外，現更聯絡中學教員，組織團體，資助計劃外圍同志赴渝服務。”有二同志去冬被捕，後陸續釋放。(乙)機關：(一)北京高校仍為掩護辦公及集合同志機關。(二)鄉村小學為鄉教中軸及同志避難機關。(三)駐滬聯絡處仍由王佩齋主持。(四)天津新設交通站。(五)小學中軸現已樹立，中學中軸正進行中。(丙)輔助救濟：(一)資助同志及外圍同志數人赴渝。(二)贖胎在渝同志及外圍忠貞同志家屬子女。<sup>⑦</sup>但仍然未對創辦文史雜誌一事作出答復。

平滬雙方溝通不暢的情況持續到6月30日，北平方面才正面回復，沈兼士等人的來電稱：“文史雜誌及普通刊物均須經敵偽注冊，始克發行。刻正覓取路綫，一俟獲得認許，即行擬具預算及計劃電請核奪。茲為充實人才，促進會務，擬增李霽野君，化名朱耀祖，為本會委員，李君專攻文學，曾充津女師院英文系主任，現為輔大教授，此次參加本會，擬出任以出版之計劃及推進工作。”朱家驊立即批示：“請從速籌辦。現上海有何柏丞兄主辦之《學林》，此間則有《文史》半月刊，下月起由顧頡剛兄接辦，滬滬平三地有此有利刊物互相密切聯繫，提倡民族復興，闡揚本黨主義，轉移文風，糾正青年思想，以立建國之基礎，關係國家民族之前途殊鉅。”<sup>⑧</sup>并於7月2日復電，希望能於最短期內使之實現。

稍後，北平文教協會擬就《以文史雜誌社為中心聯系華北淪陷區忠貞學者辦法》。<sup>⑨</sup>按照這一辦法，淪陷區忠貞之文教學者分為兩類，“一類是既富有國家民族意識，崇信中央政府，且已參

加本黨或同情本黨者，一類是雖富有國家民族意識，而對於本黨與異黨持騎牆態度，或對本黨持懷疑觀念者。前項學者已由華北文協取得聯系，參加工作，或正在設法聯系，後項學者則因須保持文協機密，擬不請其參加文協工作，而以文史雜誌社為中心聯系之，由增加其與中央之關係逐漸勸變其思想態度。”文史雜誌社由純正學者主持，國民黨“應派一與學術界接近之忠實同志參加社中，巧妙運用學術思想之探討研究，逐漸使與文史有關之學者信仰本黨主義，成為本黨忠實同志。”聘請華北淪陷區忠貞學者為該社特約編輯，以北平文協總會為介引聯轉機構，文史雜誌社對所聘特約編輯可由北平文協轉達意示，所有應聘特約編輯，如對文史有所貢獻，可由北平文協設法轉來。特約編輯為無給職，如對學術或抗建工作確有貢獻，而生活確極困苦者，可酌予不定期救濟金，由北平文協轉送。文史雜誌托商務印書館每期寄往天津分館代售，并電令平津文協於書到時購買若干份，分送各大學及圖書館，“以廣傳布而暗系人心”。擬聘為特約編輯的有原俄文法專校校長王之相，原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王桐齡等。不過，從目前資料看，該雜誌并未實際刊行。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北平形勢日見險惡。先是英千里被告密遭日方逮捕，囚禁三個月，後來據說又有人在敵偽報紙上發表消息，說聞沈兼士將辦一國學刊物，李霽野將辦一新文學刊物，收登社會上家居不出的人士的稿件，稿酬甚豐，經費據云係有固定來源。等於是變相向敵偽告密。<sup>⑩</sup>1942年4月初，北平方面突然來電告急：“此間環境日惡，敵方傳將不利於弟，馬君被逮後，已虞牽累，加之輔大經費告竭，敵偽乘虛侵入，將成事實。弟唯有先機出走，現擬協同文協總干事蘇民赴渝，面陳一切，并報告各項工作及將來計劃。”<sup>⑪</sup>朱家驊對此有些意外，復電表示：“北方電訊阻絕已有數月，日內甫通。兄來渝甚好。輔大經費中央決可補助，在美捐款亦當設法使轉滬寄平，敵偽借此企圖侵人，仍希設法力拒為盼。”實際上很不情願放棄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淪陷區組織聯絡系統，“兄來渝甚好”一句，底稿是“自無

不可”，難以割舍之情溢於言表。<sup>②</sup>4月11日，朱家驊再電沈兼士：“輔大款事已電宋、胡兩兄代收匯渝轉平，中央補助款可即匯發。北方工作因電臺及其他關係窒礙叢生，又來電僅收到十之一二，致莫明實況，使各同志增加困難。頃平津同志到此者日多，真像已明，決徹底整頓，由部另設電臺，布置交通網，妥覓匯兌路線，務實工作得以加強，諸同志亦可安心服務。過去工作技術不够，危險至多，此後必須避免橫的聯系，化整為零，分別負責，文教會及刊物應獨立活動，仍由兄全權辦理，密作黨部外圍，與其他單位絕對隔絕，已囑徐敬仁兄切實遵照。渠即將啓程，五月底可到平。兄如不能繼續安居時，宜及時離開。”<sup>③</sup>

在極其困難危險的條件下，沈兼士又堅持了半年多，直到1942年12月16日，在被列入黑名單，敵憲即將實施抓捕的情況下，沈兼士才微服離平潛往後方。是月30日，日軍憲兵果然實施逮捕，沈兼士幸免於難。此後，華北文教協會其他成員繼續堅持活動。據說最盛時會員達數百人，并以輔仁大學校友會為聯系，在開封、濟南、太原等地設立分會。1944年3月11日、21日，日本憲兵大舉搜捕抗日組織人員，華北文教協會負責人及成員英千里、張懷、董洗凡、葛信益、葉德祿、趙光賢、孫碩人、孫金銘、歐陽湘、左宗綸等數十人先後被捕入獄。<sup>④</sup>遭此重創，華北文教協會遂告瓦解。

綜觀抗戰時期國民黨在北平古都文教界活動的成敗，除了客觀條件的局限，主觀立意與具體做法不無可議之處。面對外來強敵，國民黨的民族大義仍然以中央統一和本黨主義為基準，至少難辭狹隘之責。在這樣的眼光之下，無論戰前還是戰時，工作的用力不免常常偏離軌道。對外如此，內部亦然。國民黨內派系衆多，盡管當事人公開否認，實際上不僅存在，而且盤根錯節，嚴重影響國民黨的決策與執行。本出同源的朱家驊與二陳，輪流執掌組織部和教育部，各有人脈，互相拆臺，北平尤為雙方爭奪的重點，暗地的角力持續到戰後（關於雙方在文教界的矛盾與鬥爭，另文詳論）。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淪陷區設有不少機構，可惜彼此不能配合，反而相互掣肘，平津兩地的黨部，即一直無法協調，加上敵後工作者缺乏必要訓練，組織、聯絡等方面屢屢不守嚴格的保密規則，使得華北文教協會窒礙叢生，迭陷危境，并最终失敗，令沈兼士等人的長期努力付諸東流。滯留北平的文教界人士失去主心骨，迫於生活和時勢，不免動搖依附。戰後國民政府在處分北平偽文教機構及其人員時採取強硬政策，固然義正辭嚴，追根溯源，當也難辭其咎。

【桑兵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注 釋

- ① 參見邵銘：《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1932-1937)》，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6月；李盈慧：《抗戰前三種刊物對中日問題言論之分析——〈東方雜誌〉、〈國聞周報〉、〈獨立評論〉之比較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6月；李雲漢：《抗戰前中國知識分子的救國運動——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徐復觀等：《知識分子與中國》，臺北，時報出版社1980年8月，第387-415頁；楊奎松：《七七事變前部分中間派知識分子抗日主張的異同與變化》，《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91頁；蔣永敬：《胡適與汪精衛對中日問題之討論》、《胡適的和戰論》，均載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韓國]車雄煥：《戰前平津地區知識分子對日本侵華反應之研究：1931-1937》，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3月。
- ② 參見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頁；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頁。本文的資料收集，得到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幫助，謹致謝忱。
- ③ “‘北平為中國文化中心’一說，是非且不論，北平之有學術空氣，他處無之，乃是實在。今華北局面不可測知，而東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學術空氣，成何國家？此一責任，中央大學無能為也。洋涇濱尤無能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啓發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
- ④ 《與顧頡剛商洽北平新聞事業》，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此為綜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關函電多通。此節凡未注明者，均出自該文。
- ⑤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悛——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52—157頁。
- ⑥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55頁。
- ⑦ 胡頌平著：《朱家驊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第37-38頁。
- ⑧ 胡頌平著：《朱家驊年譜》，第38頁。
- ⑨ 1937年1月3日傅斯年致函蔣夢麟、胡適、周炳琳：“昨日下午五時到京，……我這次到北平，想不惹得人疑神疑鬼，其實還是上次往保定之故事，一人做一人的主意，是臨時高興，既不是有何等使命，尤不作偵探也。”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9頁。
- ⑩ 1939年1月7日通俗讀物編刊社致朱家驊函。
- ⑪ 參見山根幸夫：《近代中日關係の研究——對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女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頁。
- ⑫ 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等[抄件]，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檔案。

- ⑬ 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蔣介石函。關於胡適的態度及表現，馬叙倫《我在六十歲以前》的記述有所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103-105頁）。
- ⑭ 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 ⑮ 法本義弘：《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考》，東京，國民社1943年，第229-237頁。
- ⑯ 法本義弘：《東亞文化協議會存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考》，第247-255頁。
- ⑰ 朱家驊檔案301-01-06-202《文教協會卷》。英千里，原檔多處又作（或改爲）蔡千里。
- ⑱ 葛信益：《沈兼士傳略》，晉陽學刊編輯部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5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頁。
- ⑲ 抄1939年9月17日吳世仁 電。朱家驊檔案文教協會卷。另參《華北文化教育協會概況》。
- ⑳ 1940年1月27日郭若泉致葉楚傖朱家驊養電。
- ㉑ 1940年1月25、26日喬翔遠致朱家驊有電、宥電。
- ㉒ 1940年1月31日朱家驊致喬翔遠電。韓季通即沈兼士。
- ㉓ 1940年1月10日、11日秉禾致朱家驊。秉禾爲沈兼士化名，于主教爲于斌（野聲）。
- ㉔ 1940年2月11日喬翔遠致朱家驊電。
- ㉕ 1940年3月8日章毓庵致朱家驊江電。
- ㉖ 1940年3月11日朱家驊致元正之、章毓庵電。
- ㉗ 1940年5月8日朱家驊復沈兼士電。
- ㉘ 1940年3月7日葛方致朱家驊虞電。
- ㉙ 1940年4月15日郭若泉致朱家驊葉楚傖刪電。
- ㉚ 中央秘書處抄北平市黨部卯儉電（1940年4月28日）。
- ㉛ 中央秘書處抄教育部函（1940年5月11日）。
- ㉜ 抄中央秘書處會計、機要處簽呈（1940年5月14日）；1940年5月22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
- ㉝ 1940年8月16日沙孟海致朱家驊函。
- ㉞ 1940年8月11日郭若泉致朱家驊真電。
- ㉟ 1940年9月5日子復生致朱家驊歌電。子復生即王若儻新的化名。
- ㊱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8月，第40頁。
- ㊲ 1940年9月5日沈兼士等致朱家驊函。
- ㊳ 1940年10月23日趙志誠致朱家驊梗電。
- ㊴ 1940年11月18日朱家驊致中央秘書處。
- ㊵ 1941年3月31日沈兼士致朱家驊。工作報告原擬托比利時使館書記官帶去，因其有難色，另寄。褚君，褚成猷，重慶派赴北平工作者，化名徐敬仁。董洗凡，輔仁大學經濟學教授。



- ④1 1941年4月2日朱家驊復沈兼士。
- ④2 1940年6月3日朱家驊致葉楚傖函。
- ④3 1940年4月26日何炳松致朱家驊函。
- ④4 1940年4月27日何炳松致朱家驊函。
- ④5 1940年6月5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
- ④6 1940年6月11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
- ④7 1940年6月18日葉楚傖致朱家驊函；1940年6月2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會計處致朱家驊函。
- ④8 關於學術講座一事，參見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頁。款項來源本來是教育部，實際由朱家驊墊付。
- ④9 1941年4月25日何炳松(化名何如茂)致朱家驊函。
- ⑤0 1941年1月7日朱家驊致顧頡剛函。
- ⑤1 1941年1月11日顧頡剛致朱家驊函。
- ⑤2 1941年2月25日顧頡剛致朱家驊函。
- ⑤3 1941年3月1日朱家驊致顧頡剛函。
- ⑤4 張效之致朱家驊函。
- ⑤5 1943年3月1日顧頡剛致朱家驊函。
- ⑤6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第318、320頁
- ⑤7 1941年6月10日章毓庵致朱家驊辰電。
- ⑤8 1941年6月30日致朱家驊電。
- ⑤9 高挺秀致沙秘書函。
- ⑥0 沈萃、沈泰、沈節、沈兌：《記先父兼士先生抗戰期間二三事》，《沈兼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第29頁。
- ⑥1 1942年4月6日章毓庵致朱家驊寅電。
- ⑥2 1942年4月7日朱家驊復章毓庵電。
- ⑥3 電稿文字有所出入。
- ⑥4 葛信益：《沈兼士傳略》、馬英林：《邪正古來觀大節，是非死後有公言》，均見《沈兼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第6、10頁；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第740頁。